

解读《鹖冠子》



当代汉学家
论著译丛

从论辩学的角度

主编 李学勤
葛兆光
[比] 戴卡琳著
杨 民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当代汉学家论著丛
解读《鹖冠子》

从论辩学的角度

主编 李学勤
葛兆光
[比] 戴卡琳著
杨 民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0-0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鹞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 (比) 戴卡琳著;
杨民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10

(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ISBN 7-5382-5872-8

I. 解… II. ①戴… 杨…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②
鹞冠子-研究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838 号

出版发行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主 编/李学勤 葛兆光

策划编辑/俞晓群

责任编辑/王丽君 李忠孝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李守勤

印 制 者/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 销 者/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225 千字

印 张/10

插页/4

印 数/1—2 000

定 价: 15.00 元

中文版序言

一本书绝不是一个人的产品。写作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作用，阅读也是一种读者和作者合作的形式，这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时，每作一种具有创见的解释就都会给该书附加许多意义。现在拙著译成了中文，也只有在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思考和写作受到了他人多么大的影响。我曾经听过他们的讲座，阅读过他们的著作，缺少了这一点，我又如何去写作这部作品？因此，这本书只是在各种论及《鹁冠子》和早期中国文献的著作中，有可能产生的一种而已。这本书的思想观念，不但是受到广大的西方背景的激发所产生，而且这些思想观念也是一反这个背景而出现的。比如说，人们习惯将中国的诸子称之为“哲学家”，并且以“哲学家”来对待他们，期望他们写出和谐一致的本体论、认识论或者形而上学的理论，凡此，也都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作用。我一反这种研究途径，借助了西方的一种“论辩学”传统（“rhetorical” tradition）。这个传统至少和西方的哲学一样古老，但是却鲜为人知。

因此，对于《鹁冠子》中表达的思想观念，我一直避免使用“哲学”这个术语，而把“rhetoric”规定为中国的术语，作为一种取代选择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修辞学”这一术

语都不尽合适。因为这样的翻译是坚持一种传统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观，也就是说认为语言实际上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经过装饰的反映，这样的语言观我是表示怀疑的。为了从更积极、更有作用的意义上来看待 rhetoric 一词，我们使用了“论辩学”这个术语。阅读本书，有的中国读者可能对这种选择的方法比对《鹖冠子》更感兴趣，有的读者又可能对这里所讨论的内容和一些论题缺乏兴趣，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中文的翻译大大增加了对此书付出心血的人数。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教授，他热心提议把此书翻译成中文。我的中文知识有限，难以像清华大学的杨民先生那样去认真而流畅地将此书翻译出来。这里我要向他们二位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我并不期望他们去为此书的内容承担什么责任。我也感谢北京大学我的中国朋友和同行，因为我同他们一起通读了译文，对书中的术语和思想观念的意思作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讨论。虽然我们常常轻松自如地从原来的文本中走出来，言及近来的学术动态，我却没有将这些对《鹖冠子》或者相关论题的任何学术成就收入书中。不过当这些研究与本书有某种关系时，我也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加入了几个条目。

现在，随着中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对本书产生的各种新的解释，随着创作者不断地增加，我不能再说对这部著作拥有完全的专利权了。这部著作将会变化发展，就像《鹖冠子》可能曾经这么变化发展一样。这里，我要对所有加入这个变化发展过程的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也诚恳地接受他们的建议。

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比利时鲁汶大学

1998年6月

前 言

我在夏威夷大学学习的时候，开始接触《鹖冠子》一书。当时在那儿有一些学者正在研究中国早期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有《淮南子》《吕氏春秋》以及二十多年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的黄老帛书等等。那时葛瑞汉先生（Angus Graham）尚在世，在夏威夷任客座教授（1989—1990）。在葛瑞汉先生的要求下，我们着手《鹖冠子》一书的阅读课程。我们知道，他那一段时间已经广泛地研究了《鹖冠子》。这部著作，大家公认为晦涩难懂，文本的阅读和内在的哲理都错综复杂。阅读此书，我们当然希望葛瑞汉先生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在鲁汶大学学习哲学的时候，逐渐熟悉了论辩学或者修辞学传统（rhetorical tradition）。“rhetoric”这个概念在西方的传统里意思很多，它或指试图为某人在每一谈话中所隐含的主张进行辩护，或指对某人话语的说服力作明确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述论辩学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rhetoric”的这两个基本含义。除此之外，这个术语也指研究语言和文献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哲学”方法迥然不同，因为它特别关注各种主张对其所处的文化、政治、情感以及语言的依赖性和影响作用^①。

近来，西方的“rhetoric”一词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在汉学研究领域，它却很少受到关注。这部分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修辞“艺术”（a rhetorical “art”）是在古希腊建立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代代相传，而中国古代却缺乏这种修辞“艺术”。但是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中国的典籍在各种意义上说来都是具有论辩性的，从论辩学的角度去研究它们，人们也能够受益获惠。考虑到中国传统中重视说话和写作的效果，许多古典文献，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种意义来说，显然也是具有论辩性的。即便中国缺乏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那种历史悠久的修辞学传统，但中国人对言语的重要性及语言的力量也多有论述，我们如果将它作为西方修辞艺术的有效替代品，并详加考察，也是非常值得的。最后，作为一个中国哲学的学者，在这个论辩学潮流的影响下，我逐渐意识到，这部属于“诸子”，或者在传统文献学中放在这一种类下的论著，并未因为人们将它称做“哲学”，因此当做“哲学”看待而得到多少益处。这个“哲学”的标签只是在上世纪末才贴在这部论著上的，其宗旨在于使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文献学或者思想范畴协调一致。

在本书中，《鹖冠子》与论辩学最终相遇了。对于中国文献所作的传统式的和现代式的学术评价，我们都不应该仅仅看成对事实的或真或假的描述，而应该看成是对具体的语境中特定期待的一种回应。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本书对《鹖冠子》文本复杂性的探讨（第二章到第五章）才可以说在方法论上是论辩学的。本书第六章到第九章，对此书内容的阐释也是论辩学的，这有多种意义：对于《鹖冠子》一书，我们主要不是将其作为对现实作中性的描写来阅读，而是将其作为植根在一种政治背景下，由特殊的忧患意识所驱动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来阅

读。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进一步集中在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论辩的方法上，而不仅仅是集中在由它们所传递的一些思想观念上。最后，《鹖冠子》一书的作者对语言的力量、界限及其来源都有明确的观点，而本书则把这些观点描述为在西方已分化为要么是“论辩艺术”，要么是“语言哲学”的，某种总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式的对应物。我认为，在论辩方法上，具体的语境、语言的含蓄使用和语言上观点的明确，这三者的关系不但错综复杂，而且相互也起到了加强的作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论辩学意义上的直觉，亦即政治和道德的现实并不是有待于客观之士去发现的事实，它们也依赖于我们用来构成这种现实的语言。虽然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阅读其他古代的中国文献，但是《鹖冠子》却证明了，更深层次地理解这种直觉行为，能够将它作为颇为有利的视角点，由此出发，去考查和探索其他的文献领域，做《鹖冠子》与“论辩学”之间的“月下老人”。

将《鹖冠子》同论辩学统合起来研究，我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许多人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奎恩廷·斯基纳（Quentin Skinner）和何莫邪（Christopher Harbsmeier）送了我有价值的材料。安乐哲（Roger Ames）、德狄因（Herman De Dijn）、戴约斯（Jos Defoort）、葛瑞汉（Angus Graham）、爱思灵（Sam IJsseling）、李培德（Ulrich Libbrecht）、罗浩（Harold Roth）、席文（Nathan Sivin）、华贝妮（Benedicte Vaerman）、杨有维（Yang Youwei）以及 SUNY 出版社的编辑，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我特别感谢安乐哲和席文，他们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我，不断地给予批评、帮助和支持。我受到了一些电脑专家的帮助，其中有鲁德·梅维斯（Ludo Meyvis）、施马克（Marc Schreurs）、维尼克（Veronique Preuveneers）和冯道伦（Karel Van Doren）。他们都为《鹖冠子》与论辩学在思想上终成眷属

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当然，笔者应该对本书的一切负全盘的责任。我也要感谢台湾的教育部门，为我提供了在那儿三年学习的基金；感谢鲁汶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为我在宾大两次的短期研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最后，我也要对我的丈夫马克和我的父母表达感谢之情，当然，这就远远不只是因为这本小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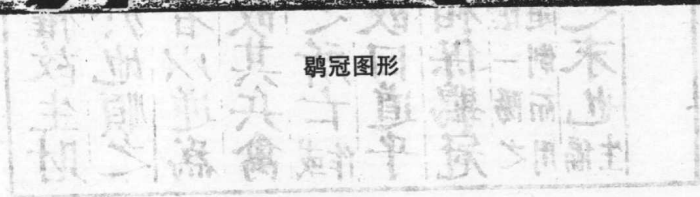
关于引文

所有《鹖冠子》中的引文，除了另作标明的以外，全部来自“万有文库”的《子汇》本，全文附录在本书的后面。涉及中国的古典文献，我即标出书名，接着以阿拉伯数字标出章节，如果有关系，则一并标出页码和行数。比如《鹖冠子》15:97/3，则表示是《鹖冠子》一书的第十五章，第97页，第三行。其他文献资料的版本，使用者则在参考目录中列出。引用新近的学术著作则以以下方式注明：“作者（年：页注）。”在必要处，则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作进一步的辨别和调整，比如葛瑞汉（1986. S）和（1986. Y），表示葛瑞汉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不同出处。使用斜体字，意指外来的术语或者有意的强调。方括号包括我在翻译和引用中附加的材料。虽然对现存凡可以查到的译文，都标示了参考书目，但是我在必要的时候，对译文仍然有所变动，旨在使此书有一个统一性。

問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執在權故生財
有過富在執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
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
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貪以患為利故其兵禽
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斥
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故曰道乎
道乎或作道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鵲冠
子曰賢生聖賢上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神神明者正之末也偏
之謂之法利用出入神生明神下神明者正之末也偏
民咸用之謂之神神故曰正之末也或作未受之本是故相保



鸛冠图形



真一牛草《千觀經》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关于引文

第一章 《鹞冠子》与统一性的矛盾	(1)
1.1 对统一性的期待	(3)
1.2 残篇断简的庆典	(6)

第一部分 作为一种散乱文本的《鹞冠子》

第二章 传记材料以及对单一作者的期待	(15)
2.1 传记和文献目录中的籍贯	(16)
2.2 鹞冠子的籍贯和生活年代	(19)
2.3 关于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26)
第三章 文献目录以及对篇幅和类别统一性的期待 ..	(34)
3.1 《鹞冠子》一书的篇幅	(36)
3.2 《鹞冠子》的类别	(39)
3.3 混合的假设	(44)
3.4 对类别的进一步讨论	(47)
第四章 注释材料以及对文体统一性的期待	(58)
4.1 对《鹞冠子》文体的指责	(60)
4.2 对《鹞冠子》的注释	(62)
4.3 从鄙浅的文体到抄袭	(65)
第五章 文献材料以及对文本统一性的期待	(77)

5.1 一个讹误的文本	(78)
5.2 从文本的讹误到注释的纂入	(80)
5.3 间接的文献材料	(82)
5.4 直接的文献材料	(97)

第二部分 作为论辩学文本的《鹞冠子》

第六章 一部注意论辩学艺术的著作	(111)
6.1 论辩学、政治主张和挫折	(112)
6.2 对君主的告诫	(118)
6.3 君主和圣人	(129)
6.4 政治失败之因	(136)
第七章 论辩学的语言使用	(144)
7.1 运用语词的力量	(145)
7.2 再定义作为论辩的手段	(154)
7.3 语言力量的其他一些例证	(166)
第八章 一些政治性的语言观	(175)
8.1 对“名谓”的讨论	(176)
8.2 名谓之源	(189)
8.3 命名的规范	(199)
第九章 超越名谓	(208)
9.1 自然之法	(209)
9.2 名谓的未名之源	(218)
9.3 来自未名的命名	(225)
附录1 避讳:正字和端字在《鹞冠子》中的分布	(233)
附录2 《鹞冠子》中专名的分布	(234)
附录3 从汉代到元代的直接材料	(238)

附录 4 早于明版本《鹖冠子》的间接材料	(240)
附录 5 《鹖冠子》的十九篇	(246)
注释	(247)
参考书目	(290)
译者后记	(307)

第一章

《鹖冠子》与统一性的矛盾

在中国哲学这个研究领域里，《鹖冠子》一书给人两种十分突出的感觉，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这部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道家类的著作，对于研究诸如古代中国思想中“元气”概念的演变以及“自然法”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来说，都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期望^①。但是它内容的晦涩难懂却常常使得这种兴趣转化为愠怒、冷淡，最终使人们将此书漠然置之。这种种晦涩难懂，再加上其作者是谁在整个历史文献中根本不能得到证实，因此《鹖冠子》便被定成了一部“伪书”。这部著作，就其许多章节的讹误、文笔的“鄙浅”、文字的逐时递增以及内容的混乱而无内在联系等等而言，都遭受了后人的不断批评。李约瑟（Joseph Needham）觉得《鹖冠子》的一些“段落，令人出奇地感兴趣”，但是因其文本的复杂难懂，时代的难以确定，李约瑟也不想去对此书作详细的叙述。李氏的这种含糊而且主要是否定的态度，代表了人们对《鹖冠子》一书看法。李约瑟说，“这部著作，因为内容相当混杂而极难确定年代……在其年代经过考订而确定之前，任何阐释都只是仓促之说”（李约瑟 1956：547）。

从唐代到清代，学者们几乎一致轻视《鹖冠子》一书，认

为它在学术上价值不大。这种否定的论断，在清代，第一次受到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和《鹖冠子》的研究者，比如俞樾、孙诒让以及王闿运等人的挑战^②。但也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主要由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四种黄老帛书^③手稿的发现，其中内容的表达方式、思想观念、文体风格等，与《鹖冠子》一书都有着特别的相似之处，对《鹖冠子》一书的研究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不过《鹖冠子》一书在中国，除了张金城写了一本《鹖冠子笺疏》（1975年），浦伟忠作了白话翻译之外（1992年），仍然是一块未被深入研究的领域，迄今，也仍然没有一种任何其他语言的《鹖冠子》全译本出版问世。

我们并不一定要等到最终解决文本的晦涩难懂之后，方才去进行哲学的研究探索。确实如此，从今天来看，除了十几篇多数是用中文撰写的文章之外，一些为数不多的主要的研究工作还是投入了这部著作的文本研究之中^④。结果，在《鹖冠子》的研究者中，他们的学术观点，逐渐从占压倒性多数的否定论断——不论是全盘否定，还是部分否定——转移到了谨慎的肯定立场。和往昔的长期认识不同，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这部著作大部分是较为统一的、连贯的、可信的^⑤。虽然至今尚无一本专著就其内容而写作，但是近来还是有一些论及《鹖冠子》的哲学文章发表问世^⑥。

无论如何，近来一部分学者对《鹖冠子》的整理，并没有形成一般的共识。讨论仍然在两种意见之间进行。因为该书明显的散乱零碎，一些学者对此书加以排斥，另一些学者则在现存零乱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再建其具有统一性的哲学，恢复《鹖冠子》一书的原貌，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本看待。人们因为此书的零乱而普遍地感到不安，但是又都对其统一性寄予了期望。排斥和试图复原该书的两种做法都因以上两种认识

而获得了立论的根据，相较之下，人们对以上两种感受本身却很少给予明确的思考。

1.1 对统一性的期待

正如一位中国作家所说，对知识的任何讨论和断言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个基础自身却又了不可见（《庄子》25:71/52-53 葛瑞汉译本 1986: 102）。在《鹖冠子》的研究领域，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于统一性的期待（the expectation of unity）。学者们曾经将《鹖冠子》作为一本书来对待，因此很自然地会期望它有某一位作者，在某一时间最终表达了一组连贯有序的思想观念。但是因为《鹖冠子》一书使得这些期望落空，所以它引起了一些人将其视作伪书而排斥拒绝，另一些人则试图将它重建，使它成为体面的哲学。这两种反应都是建立在一个对统一性进行论争的复杂的网络之上的。

统一性的探求

如果我们听一场报告演讲或者阅读一本书，我们会期望在其中发现一种统一性：某个人在一段时间，表达了一组统一的或者连贯的思想。如果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主题或者风格突然发生变化，思路明显的不连贯，那都会促使听者或读者去探寻一个更为基本的统一性。一个作者所作的陈述相互有着联系性，与主题相关联结，或多或少具有趣味，可以理解，这一看法不仅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心态，甚至可能是一种道德的责任。正如格利斯（H. Grice）所说，在一个特定的文本中，“协同原则”（principle of cooperation）要求读者去寻找统一性^⑦。如果一个同事在工作之时，对一个关于老板的恶评作出反应，